

讀
周
易

趙又春 著

CS

岳麓書社

我讀周易

趙又春 著

CS

岳麓書社·長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读周易/赵又春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3.9

(赵又春读经典)

ISBN 978-7-5538-0178-0

I. ①我... II. ①赵... III. ①《周易》—研究
IV. ①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4876 号

WODU ZHOUYI

我读周易

作者:赵又春

责任编辑:饶毅

责任校对:舒舍

封面设计:谢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淘宝网: <http://ylbooks.taobao.com>

2007年11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4

字数:388千字

印数:6,001—10,000

ISBN 978-7-5538-0178-0/B·114

定价:28.00元

承印: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序



本书书名中的《周易》，是指与《易传》对言的《易经》，即只包括作为此二书之“合订本”的《周易》中的六十四卦的卦画，和“系”在每一卦后面的卦辞与爻辞，可称本义的或狭义的《周易》，《易传》只是这个《周易》的注释、解说性读物，不在本书的视野之内。不仅如此，本书正是要将这个《周易》从《易传》的笼罩下解放出来，还它以本来面貌。所以本书的任务和内容是：完全不提、不顾《易传》关于《周易》所说的一切，不引证，也不批评，彻底抛开传统的“以传解经”的解《易》模式，仅凭训诂和逻辑，对《周易》作全新的解读。迄今人们所说的《周易》是经过《易传》“浸染”、“过滤”了的《周易》，这样读出来的《周易》才可能是《周易》原作者心中的《周易》。本书就是想把这样的“本真本然”的《周易》奉献给读者。

其实，我本来并不熟悉《周易》，直到决定写作本书之前，都还没有把《周易》全文仔细地读过一遍，只是偶尔翻阅一下，目的仅是希望从中找到一些讲授哲学原理时用得上的例证，好使我的哲学原理课上得更加生动些。那样阅读自然不可能形成自己关于《周易》的观点。我决定写作此书乃起因于我的同学、老乡、挚友金春峰先生的鼓励：我在送给他拙著《我读〈论语〉》时曾向他表示，我没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只有点雕虫小技，弄不出像样的大东西来，所以写完《我读〈老子〉》后将不再写什么了。他鼓励我说，你既然在中国思想史方面写开了头，只要有心得，不妨接着写下去，不求功利，但求日子过得松快、充实一点。不久，他给我送来他的新作《〈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时，就具体建议我写关于《周易》的书，还口头给我开了个必读书目，特别嘱咐我，一定要读一读《周礼》。我记得，他怕我不知



《周礼》是部什么书，竟一点不避嫌疑地解释说：“《周礼》也叫《周官》，是……”我听了老金的话，很是感动，并且想：既然他劝我写，我写作中遇到困难了，他就会帮我的。就这样，我开始找来注释、翻译、讨论、研究《周易》的书，认真阅读起来。我一共花了八个月时间，读了几十本书和十几篇大文章，另外还在网上看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和几篇短小的精妙之论。这期间，有几个月我去加拿大探亲了，在儿子家里做客，可以在老伴面前“耍赖”，拒绝做任何家务事。在异国他乡，连个闲谈聊天的人都没有，这使我得以安心地几乎每天都坐到安大略湖旁边去啃我带去的那八本大书。我素来读书效率不高，慢得要死，那几个月则很不错：李镜池先生的《周易探源》细读了两遍；黄寿祺、张善文二先生的《周易译注（修订本）》、马恒君先生的《周易正宗》、孙振声先生的《易经入门》，不但读得认真仔细，还作了详细的笔记；一本《周易大辞典》和朱伯昆先生的两大卷《易学哲学史》，也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王弼的《周易注》则在读以上各书时随时翻阅，真不知读了几遍，只知能背下不少句子了。

回国后继续阅读，但读着读着，竟越来越觉得注释类著作没有必要读得更多了：都是以《传》解《经》，大同小异；属于“各抒己见的理解和翻译”，似乎大多只是错得不一样；充满了爻位说、卦变说之类的“象数阐释”，不讲道理，又无可证伪。我于是深感朱熹说的那句《易》学史上的名言——“且须熟读正文，莫看注解”，在今天还仍然有其指导意义。这时我也开始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统的由《易传》开创的解读《周易》的路子，可以概括为“据象解辞”，但这条路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从理论上说，走这条路乃意味着只看到了《周易》的卦爻辞可能是“观象系辞”的产物这一面，却完全忽视、否认了，它一经产生，就必然会由于文字对人的心理和思维的“威力”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迫使占筮者反过来“据辞选象”，以至“因辞起象”，所以后来的情况是卦画引发的“象”和文字（卦爻辞）唤起的“象”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从发展看，后者的力量和作用当是越来越大，以至最后居于主导地位——当卦爻辞定稿，《周易》真正成为一

部书,从而有人只能作为读者来读这本书时,如果说还有“象”,那象就主要或完全是由文字来决定了。刘大钧先生在其《周易概论》中说:“所占卦爻之辞的吉凶对于占卦者没有多大意义,解卦之人愿说吉,就可以找到吉的理由,愿说凶,就可以讲出凶的原因。”这道出了占筮的迷信性质,但只能说是后来江湖术士对《周易》的一种“应用”,并非《周易》成书以后,它的作者仍然允许使用者随心所欲地对他编定的卦爻辞作解释。如果这样,他就毫无功劳,《周易》就毫无价值,就不必有也不会有这样一部“书”了。

二、从结果上看,走了两千多年的“据象解辞”的路子,只是极大地夸张了《周易》的神秘性,以遮蔽、扭曲其“本真本然”面貌为代价,给它换来诸多虚幻的荣誉,同时把对于《周易》的研究引入了死胡同。人们都说《周易》是部奇书,予以极高的评价,给它戴上了“百科全书”、“中华民族哲学思想之源”、“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等等桂冠,但真正的和最大的奇,应说是人们还没有读懂它,完全没有把握到它的内容,就争相来给它写这样的评语。清代学者皮锡瑞早就指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一个网友说得更好,只是稍嫌刻薄:“至今还没有谁把《周易》的哪怕一个卦真正解释清楚了。”足见上述评价是多么缺乏基础,多么不负责任。《周易》本身的奇,仅在全书六十四卦一律都由六条或断开或连接的线条叠成,“系”在后面的文字则多是一些不相连贯的、富有形象的词语或短句,以致解读它时大有发挥想象的余地,读每一卦都像是在读一首由若干似乎并无关联的语词和短句构成的诗篇。就是这一点“奇性”,加上关于它的产生的传说和推测,导致人们不愿直接根据它的文字去解读它,而是企图从卦画的构成形态上去寻找所谓的“象”,用这样“取来”的“象”去注释和修正语言文字(即卦爻辞)给出的“象”。这在实际上自然就是容许《周易》注家把他心中的“象”强加给卦爻辞。为了使这个“强加”显得有点道理,似乎是一门学问,才发明创造了诸如卦变说、爻位说、互体说等各种各样的“取象之法”。很明显,《周易》的上述桂冠乃是靠这样的解说得来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由于这种解说本质上具有神秘性、任



意性和无所不能性,那些桂冠原本是属于这种“解说”的,只是很自然地转移到了《周易》头上。今天,“据象解辞”作为解读《周易》卦爻辞的基本方法,必须予以抛弃了。自然,在讲“易学史”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作“人们曾经这样解读《周易》”的历史事实,向后人作一点介绍。

三、“本真本然的《周易》”乃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是当时的史巫献给侯王、君主的“政治进言集录”。是两股逻辑力量把我推向这个结论的。一是对《周易》产生过程的理论思考。《周易》原为占筮算卦之用,这已是有理有据的共识。最初的占筮人不但是当时最有文化的人,而且是侯王、君主的近臣,同时兼任史官和祭祀活动的主持人,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的参谋人员。问卦人则是享有自由又常有疑难的贵族成员或侯王、君主本人,因为毫无自由、即使神明告诉了该怎么办实际上并不能那样办的人,是不会有“算一卦”的需要的,《周易》成为方士的算卦工具书,那是它流入民间以后的事。这样,问卦人问的必多是治国施政军事外交上的大事,而在这方面提供咨询服务又本是占筮人作为“参谋”的天职,这二者的结合,岂不使占筮人“取象”时、“系辞”时和作答时,都要尽可能地朝政治方面努力,向能够满足问卦人政治要求的卦象、辞句和解释靠拢?换言之,《周易》的“初稿”必然带有“政治进言集录”的性质。后来的定稿人一定是当时最有权威的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的领袖人物,自然不会改变它的这个性质,不过把“进言”往“教诲”方面提升罢了。

把我推向上述结论的第二股力量则是我对《周易》部分卦爻辞的实际思考、解读。我试图撇开传统的“据象解辞”的套路,纯凭训诂和逻辑来解读《周易》,于是选择几卦来做试验——这几卦,在坚持“据象解辞”的注家那里,没有一家的解释在我看来是像个样子的。我立即感到,不知道这些卦爻辞作为“言说”的背景,确实不可能把它们读懂。但某一卦的背景,其实就是它谈说的中心、主旨,不过是放到了更宽阔的视野中而已,因此,对它的领悟又只能通过对卦爻辞的细心研读去获得。为了打破这个“坏的循环”,我决定根据上面说到的《周易》产生过程给予我的启发,先作最一般的设定:这几卦都应是在对侯

王、君主作政治教诲，而这也就是它们的大背景。在这个设定的引导下，我一字一句地细啃卦爻辞，务求释义都有坚实的训诂根据，力求把握它的比喻义和言外之音，进而对全卦主旨作较具体的设想，同时据以体认六条爻辞和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并不断修正之。结果，我对那几卦的我自认为“完成了的解读”表明：每一卦确实都是在作政治教诲，而且都主旨明确，六条爻辞之间的逻辑联系十分紧密，大多初爻点题，接下展开论述，末一爻恰到好处地收尾，全卦构成一篇论说生动、内容完整的小论文——原来，六条爻辞是一篇论文的完成了的提纲！

就这样，《周易》是部政治哲学著作，在我看来是不成问题了。

于是我开始动手写作本书，将目标规定为：实际搞出一个纯粹依靠训诂和逻辑解读《周易》的样本来，让易学界评估一下，看它像不像个样子，并据以判断，我这条解《易》之路是否走得通。现在全书已经写成，我可以公布我的以下数据了：

1. 全书六十四卦，明显是作政治教诲的五十六卦，不直接是政治说教，但与政治明显相关的八卦，与政治不沾边或相去甚远的，一卦也没有。

2. 全书六十四卦，每一卦都主旨明确，六条爻辞之间的意念联系十分紧密，作任何一种换位都将导致逻辑混乱，至少有四十卦明显是初爻点题，接下有有条不紊地展开论述。末一爻与初爻呼应同时总结全文的，也至少有三十卦。其余各卦，也都基本上是按这个格式安排的，只是稍有变通。

3. 全书六十四卦中有二十八对综卦（此卦倒过来看就是彼卦），其中至少有二十对，论述的内容从某方面看明显具有对立关系，其余八对的主旨、内容，也有某种相关性，只是对立不够明显。

从解读方法上说，上述情况能够用卦形所体现的某种“象”来解释吗？“观象系辞”会“系”出这样的辞来吗？从给《周易》内容的定性方面看，这些数据还不足以证明，它确实是一部有着特定对象、抱着特定目的写作的著作，是一部讲政治哲学的书吗？这里加上“哲学”一



词,是为了指明,它只是论述最高最一般的政治原则,不是针对具体政治问题而发。

以上是说明本书写作的缘起,同时显示它的内容方面的特点。下面介绍一下属于形式的方面。

1. 本书在行文风格上和我前著的《我读〈论语〉》、《我读〈老子〉》完全一样,也是将对于词、句的训释,对他人注、译的批评,和我对原文的理解三者糅合在一起,夹叙夹议,力求讲清“我是怎样达到对于这个字、这一句、这一卦的这种理解”的,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启发读者思考,和我一起来解读原文,并因而可能生发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也一律不作翻译——《周易》比《论语》、《老子》更加不能翻译。和《我读〈老子〉》一样,也既不涉及《周易》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不联系当代实际发任何形式的议论,更不作影射性的批评,只偶尔对《周易》作者观察和思考的深刻性加几句评论,以引起读者注意。

2. 对《周易》六十四卦的解说可说是本书的正文,此前安排了一篇《导论》,是对我设定的本书的“立论前提”(那只是我个人关于《周易》的学术观点),作简要的论述,但更是为初涉《周易》的读者阅读前人注译、解说《周易》的著作,提供必要的准备知识。这一部分本想作为附录放到正文之后的,考虑到认可那些“立论前提”也正是“读懂”本书和愿意将它读下去的前提,就以“导论”为题,放到前头了。因此,初涉《周易》的读者固然不能不读,其他读者也最好先看一下。我建议读者先行采纳我的那些设定,待读完本书的正文后再返回去对它们作评论。我估计,这样返回来时,至少有相当多的读者会认为,正文对那些设定所作的证明,比《导论》中作的纯推理的论证,要更加有力得多。考虑到六十四卦的卦名多不直接表达卦的主题,而为了显示出《周易》内容的全貌,也为了让读者想在《周易》中查找它关于某个问题的观点时有所依循,是需要在目录中交代出每一卦论述的一般内容的,所以我在每卦卦名之后都加了一句话,类似于“副标题”,但仅是提示该卦的主旨,而且所作的概括并非是唯一可能的。

3. 本书采用的《周易》的版本,是当今流行的、取自《十三经注

疏》的王弼本，俗称“通行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周易》帛书本，六十四卦齐全，只是偶有残缺，与通行本稍有差异，六十四卦的排序则完全不同。2001年起，上海博物馆陆续公布了它的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只有三十四卦，且多有残缺，与通行本比较，主要是字形不同者多，内容差别极少。本书作的取舍是：全按通行本作解说，我只加以标点，用字与帛书本不同时，如明显属通假情况，又不是卦名用字，就不作说明了，若字义不同，则原文仍按通行本给出，但训释务必参照帛书本来确定；文字差异较大以致影响到对于全卦主旨的领会时，则只从通行本而置帛书本于不顾——只有两卦属这情况。至于竹书《周易》，由于与通行本几乎谈不上内容上的差异，本书就没有涉及了——仅用了它的一个字作为我对它的“对应字”释义的旁证。

4. 本书引证的和批评的观点或译文，大多加上了引号——译文一律放在引号中，并且在交稿前我一一作了查对，大概没有错漏。这仅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比较、辨析资料，决无别的意思。由于完全是“对事不对人”，读者大概不会追问“这是谁翻译的”，所以绝大部分都不说明出处，而用“有人”、“有本书”这样的话领起。如有读者想要知道出处，可到附录《本书引用书目》中所列的那些书中去查找。我在《我读〈论语〉》和《我读〈老子〉》的序言中都郑重表示：对于我当作“批评靶子”的著作的作者，我是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的，没有他们的著作给予我的帮助和启发，我决写不出这本书来。这里，我同样要说这个意思，并且要加重语气地说：先生们，我敬重你们，谢谢你们！

易学界前辈金景芳先生说：“《易传》是理解《易经》的一把钥匙，没有《易传》的话，我们今日便不可能看懂《易经》。”这大概至今还是易学界的“主流观点”，但我不以为然。即使《易传》确是孔子所作，《周易》对他来说也是“古代文献”，在解读这种古代文献方面，我们和孔子应该是平等的，没有理由把他奉为不可动摇的权威；从拥有的方法、手段方面说，我们作为后人则理应在总体上超过他，事实上，对于我们与孔子共同的古人、古事和古籍的认识，至少在许多地方，我们是已经大大超过了孔子的。因此，最后我想说一句：希望本书能够作



为一部撇开《易传》，完全置传统治《易》方法于不顾，纯凭训诂与逻辑解读《周易》的彻底的、纯粹的义理派“样本书”，引起易学界的注意。我期待着对于本书的任何形式的批评意见。

赵又春

2007年6月30日于长沙岳麓山下

导论：《周易》是部什么书和怎样解读《周易》



在阅读《周易》原文或对它的注释、解说性著作之前，先大致地了解《周易》究竟是部什么书和人们是怎样读它从而是怎样向人作解说的，很有必要。这是因为不但《周易》本身是部“奇书”，而且有许多人对它的解释也很奇特，甚至更加奇特。

一、《周易》是部由占筮算卦用书逐渐演变成的古代政治哲学著作，是古代史官献给当时侯王、君主的进言集录。

先向读者交代：这个小标题对《周易》的定性只是我个人的学术观点，远非学界的共识，下文自是我对这个观点的论证，但更是通过这个论证，向初涉《周易》的读者介绍人们关于《周易》的流行观点。

1. 要知道《周易》是部什么书，首先要知道《易经》本文和《易传》的关系。

据说，古代曾经有三部算卦的书，《周易》是其中一部，另两部叫《连山》、《归藏》，后来失传了。最初的《周易》只有卦画——由两个符号叠加而成，所用的两个符号逐渐固定为两条短线，一条中间不予断开，另一条中间断开一点，以示区别。这就是今天所谓的阳爻“—”和阴爻“--”。为什么恰好是使用这两种符号？这有多种说法，我则以为仅仅是因为这两个符号最易在地上画出，又最便于刻画到竹简上，完全值得不得争论。传说这最初是伏羲氏发明的，但他只将这两种符号三个相叠，每一叠中的三个可以全同也可以不同，所以一共叠出八种形状，每一种都叫做一卦，他如何演算这八卦，历史上没有记载。后来，周文王又把这八卦两两相叠，进而得到 $8 \times 8 = 64$ 个六爻构成的卦。于是需要立新的名目了：六爻卦是两两相重得到的，古人就叫它“重卦”，相对于原先的三爻卦，则叫“别卦”，原有的三爻卦就叫“经卦”；



经卦处在六爻卦之中时，则上面的那个叫“上体”（也叫“外卦”），下面的那个叫“下体”（也叫“内卦”）——这些名目恐怕是后来研究《周易》的人立下的了。也未发现关于文王如何算卦的史料。大概在文王之前，《周易》只是指谓通过规定的演算得到一个卦形，再据该卦形对所问之事作口头回答和预测的一种“活动”，并无文字说明，因此严格说来还不能说那时已有《周易》这样一部著作，直到文王（也有说周公的），才在每一卦和构成该卦的每一爻之后，加上文字说明。至此，《周易》算是成书了，这部书就称为《易》或《周易》，后来列为经书，故也叫《易经》。所以最初的《周易》只包含两部分：六十四卦的卦形和每一卦后面所“系”的卦辞与爻辞，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为什么这样分，没有谁说得清。为了区别和便于称呼，理应每卦都有个卦名的，但卦画本身就具有区别作用，现有的文字卦名，其意义同卦的内容的联系有远有近，似乎都是后起的；从《左传》中提到某条爻辞时使用的说法看，当时还没有诸如“初九”、“上六”、“九三”、“六五”这样的用以标明每爻所处位置和阴阳“性别”的用语——称为“爻题”（这名字是高亨先生起的），故爻题必是后来的《周易》研究者发明和添加进去的，《周易》作为宫廷史巫专用的占筮之书，读的人极少，用它的人又很熟悉，并不需要有这些名目。

到了春秋以后，《易经》开始传到民间，读它的人多了，加之它实在太难懂，于是有了注释它的著作，终于出现十篇权威性的“辅导资料”，称为“十翼”（“翼”就是辅助义），假托孔子的名义广为流传。由于注释或阐发经义的文字古时称“传”，所以这十篇文章合为一书就被称为《易传》。后来，《易经》和《易传》被并在同一书中，再后来，《易传》中的部分内容还被分拆开来，搅入到《易经》之中了。从那时起，《周易》（或者《易经》）这个书名开始有了二义：狭义上是特指加上了卦名、爻题后的原初的《易经》，广义上则包括《易传》在内。谈到《周易》的产生时有句名言：“人更三圣，世厉三古。”但它讲的是广义的《周易》，本书“读”的则是狭义的《周易》，并且对《易传》完全不予涉及——不作半句引证，也不作任何批评。

2. 如果是通过他人的介绍来了解《周易》(上述狭义的《周易》)是部什么书,务必先行弄清,介绍者究竟是针对《周易》古经作介绍,还是实际上主要是在讲《易传》。

这个区分,对初涉《周易》的人来说是很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历来研究《周易》的人,尤其是当今学者,每讲到《周易》,特别是在作评价性的论述时,往往失之笼统,《经》、《传》不分,有意无意地把纯属《易传》的观点作为广义《周易》的思想,甚至把对《易传》的评说都完全用到《易经》(即狭义《周易》)上。下举二例。

唐明邦先生主编的《周易评注》一书,开头有篇绪论,共八节,尽管第二、三节是对《易经》、《易传》分别作介绍和论述,说明编者承认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可其余六节的标题却一律以《周易》领起,又忽略了或者说抹杀了二者的区别,具体论述时也是针对《周易》这个“共名”,但主要是引证《易传》中的说法,第五节标题为“《周易》蕴涵的民族意识特征”,从三个方面说明《周易》是“国魂之典范”:突出的主体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的革新意识,可引作证据的材料竟没有一条、一句出自《易经》,全部是《易传》中的说法。

王树人先生的《回归原创之思》一书,上篇第一章是讲“《周易》的原创之思与‘象思维’”。作者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从“现代研究的视野”出发,颇深刻、独到地论述了“易道之博大”、“易道之观”、“卜筮之象”、“阴阳之道”、“卦爻的本真及其启迪意蕴”等五个方面,极力证明《周易》的思维是“象思维”,“‘象数’为‘易道’之本”,“‘易道’的‘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都属于‘非实体性范畴’”。总之,《周易》是“原发创生”性著作。读这样的论著,真让人兴奋,不禁对《周易》迭起敬意。但回过头来仔细一看,论者举出的论据,即他用来作凭证的文献资料,却绝大部分出自《易传》而非《易经》,其余一小部分则取自其他易学家对《周易》的注释或评论,真正属于《易经》的卦辞和爻辞,竟一条都没有,而且,提到卦爻符号时,也是经过《易传》“过滤”了的,就是说,对之作分析阐发时,乃是以《易传》对它的解释为基础,因而这个论据仍然属于《易传》,而非《易经》。



像上面两书这样的对于《周易》是部什么书的认定，可以完全安到《易经》——狭义《周易》（后文提到《周易》时一律是狭义的）的名下吗？当然不可以。但人们却基本上一直是这样去认识它的。因此就有了一个寻找《周易》的“本真本然”面貌的问题。这项工作在极大的程度上也就是抛开“以传解经”的老路，只就《周易》的本文去解读它，对于《易传》的说法，像对待今天的研究者对它的解释一样，也仅作参考，

我决定先走个极端：本书解说六十四卦时，完全置《易传》于不顾，连参考都不参考一下，不过暂时也不作任何批评罢了。

不视为就是《周易》作者的意思。为此，我决定先走个极端：本书解说六十四卦时，完全置《易传》于不顾，连参考都不参考一下，不过暂时也不作任何批评罢了。我的目的是：给出一个样本，看这样作出的对《周易》的解读，是否也能“像个样子”，甚或还更有一些优越之处。我这样做，在许多《周易》注家和研究者看来，可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在他们那里，“传为经生，经因传存”的观点已是不可动摇的了。但我想，他们拿《易传》的观点冒充《周易》的思想于前，我今天来探讨《周易》的“本真本然”面貌于他们之后，又何罪之有？

3. 要从内容上认清《周易》的“本真本然”面貌，还必须确定它的卦画和卦爻辞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这样说的根据是：讲《周易》的内容，自是指卦爻辞表达的思想，但如果认为卦爻辞的内容根本不能从它的文句去把握，必须经由卦爻象去认定，那么，所谓弄清《周易》的内容，岂不就变成准确地寻找卦爻辞所由得来的卦象和爻象了？而且有人正是这样主张和这样实际处理的。

从前面介绍的《周易》产生的历史过程看，《周易》确是先有卦画，后来才有卦爻辞的，换言之，作为“算卦活动”的《周易》，只需要卦画，可以没有卦爻辞，即卦爻“辞”乃在占筮算卦者的心中。问题是：《周易》成书以后是否就倒了过来，该说它作为一部“书”，乃是就它的卦爻辞而言，原有的卦画可以不理睬，不必视为这部书的必要构成部分了？显然，这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卦爻辞对卦画是否具有依赖性，而这

一点，又存在着迄今为止人们的实际处理和你的主张之间的区别。

从人们对于卦爻辞和卦画之间关系的实际处理看，卦爻辞对卦画在最初是没有独立性的，因为卦爻辞的产生就是把占筮算卦者“心中的辞”文字化，搬到心外来了，而“心中的辞”正是卦画给予他的启示，因此他一定是，也只能是用卦画来解释卦爻辞，当对卦爻辞的文字作通常的理解与他“心中的辞”不相一致时，他将认为这是因为卦爻辞写得“词不达意”，从而必是用后者来纠正、修改前者，而不会相反。卦画给予占筮算卦者的启示，亦即他因卦画而产生的一切表象、联想、感悟，用《易传》给出的术语来说，就是“象”。所以对于卦画和卦爻辞之间关系的上述认识和处理，《易传》表述为“观象以尽意”、“观象系辞”，尚秉和先生则发挥为“今之易辞，固皆古圣人瞪目注视卦象而为者也。易之卦爻辞，既由象而生，后之人释卦爻辞，而欲离象，其不能识卦爻辞为何物，不待智者而决矣”。我来打个比方，这是说：卦画相当于一张设计图，卦爻辞不过是这张设计图的说明书，图不必有说明书，说明书若是与图不一致，自然只能根据图的实际来修改说明书，而不能相反。《易传》最先揭示卦画和卦爻辞的这个曾经实际存在的关系，又是它最先对每卦卦爻辞同所系卦画的具体关系进行描述，加之这是打着孔子的旗号来进行的，因而具有极大权威性，似乎就是《周易》作者自己的陈述了，以至迄今两千多年来，绝大多数《周易》注家还是要通过或借助于卦画来理解卦爻辞，不愿、不敢离开《易传》和卦画，仅靠文字训诂来对卦爻辞作独立的解释和阐发。这就是两千多年以来，人们对于卦画与卦爻辞之间关系的实际认识和处理情况。

上面说到卦爻辞是否依赖于卦画，还取决于你的“主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卦爻辞一经产生，是否也就有了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并且这独立性日益增大，后来终于摆脱卦画的束缚而独立了，就是说，占筮算卦人逐渐把他们“心中的辞”固定化，以至终于确认某个卦爻辞文字体系对它的表述已臻完善，故而只要训诂上不出差错，读者按该体系作出的解释，与他“心中的辞”就是一致的，因而后来的“解卦人”尽管“据辞解卦”，可以不必顾及亦即不去揣摩、猜测作者



“心中的辞”了？对此当然有两种相反的主张——认定上述“实际处理”方式永远不可改变，就是这里的否定的回答和主张。我则持肯定的回答和主张。

在我看来，卦爻辞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到这时候，占筮算卦者们通过多年的“象”的积累和对以往占断之“应验率”的统计，对于某一卦和某一爻究竟是哪种“象”的代表，或者反过来说，该卦、该爻只应在心中升起哪一种“象”，已经达到了某种共识，惟其如此，才有了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的要求，并终于在卦画后“系”上对那个“象”作描述的语句——“辞”。换言之，卦爻辞的产生和使用一定不仅是为了系辞者个人便于记忆，便于以后又筮得此卦此爻时有所参考，不须临时重新去设想、创生“象”，同时也是或者更是为了使大家作的占断趋向一致，以免卜问的人和事基本相同而给出的占断却因筮者不同而大不一样，以至降低占筮的“公信度”和权威性，甚至动摇人们对神的信仰（占筮的心理根据在于相信有“神启”，但求占问卦的人又不会毫无理性，占筮的结果按说应该相同却大不一样，或者相反，理应不同却完全一致，将会使人怀疑神也不讲信用或能力不够）。否则有什么必要“多此一举”？人、事总有差异，看来相同的人事占算出不同的结果，总可以找到说辞的，各人占断不一，前后讲的不同，不是更能显示筮者技能的高低和“神性”的强弱，并增加占筮的神秘性吗？

例如泰卦卦形是乾下坤上，筮得此卦，占筮人将“创生”出怎样的“象”并据以作占断呢？一定多种多样，例如可以是：乾为天，坤为地，故这卦表示“翻天”，意味着将改朝换代了；又可以是：乾为男，坤为女，故此卦是说女人骑到了男人头上，预示问卦者将倒霉透顶；也可以是：乾为君，坤为臣，因此你占得此卦，乃说明你已大权旁落，受下人欺侮了；自然还可以是：乾为阳气，往上升，坤为阴气，向下沉，阴阳交会，预示占得此卦者将走上下畅通无阻即办事顺利亨通的好运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若无卦辞字义句义的约束，筮者就可“挥洒自如”，任意附会，那该多好！但竟有了卦辞，而且正是他们自己编写的，这当然只能解释为：客观上有了只将此卦卦形与某个确定的“象”相